

村干部创业经历、要素整合与农村集体经济

阮若卉¹ 罗明忠^{1,2}

(1.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2.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乡村振兴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基于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本文从要素整合视角,考察了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创业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人才要素和土地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集体产权边界更明晰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在村干部创业经历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务的影响不明显,但会降低村民的组织事务参与程度。因此,应多措并举激励创业精英返乡,加快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同时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制度。

关键词:村干部;创业经历;要素整合;农村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5)05-0135-13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专项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激活农村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然而,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不平衡、市场竞争力不足、经营管理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1]。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9.14万亿元,但仍有超过20%的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低于10万元^①。在此背景下,如何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主体成为关键命题。

收稿日期:2025-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运行机制与政策支持研究”(23&·ZD112)

作者简介:阮若卉(1995—),女,江西新余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罗明忠(1969—),男,江西永新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乡村振兴实验室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个人能力与经验对村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一批拥有创业经历的乡村精英在农村迅速成长,他们通过参选村两委职务参与村庄治理,主导村庄公共事务和决策。具备企业家特质的村级治理主体凭借其资源优势、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以及高效的组织协调,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户增收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引领效能。例如,山西忻州宋家沟村村支书,凭借自身丰富创业经验带领宋家沟村从一个普通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转型为“山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民通过庭院经济、民宿经营、在村办企业务工、土地流转等多种方式获得了稳定收入^②。韩旭东等(2023)通过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发现,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通过市场化运营模式带动乡村发展,在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村民经济收益及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成效显著^[2]。而对于村干部的创业经历能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有研究观点不一。

部分学者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能带来显著的资源协同效应,进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一,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社会资本和经营管理能力。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经历了市场化实践的淬炼,不仅积累了宝贵的资本与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村庄治理的稀缺性资源^[3]。在发展动力的驱使下,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会凭借自身的商业思维和创业经验,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与项目资源,为村庄发展注入持续发展动能^[4]。第二,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敏锐的市场化意识。相比传统“老好人式”村干部的“但求无过”管理理念,具有创业等特殊经历的村干部具有更大的发展追求,在市场中摸爬滚打过的经历,使他们有着更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发展导向特征更明显^[5]。

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指出,从长期看,任命具有创业经历的精英为村干部,不仅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不良后果,更会使基层社会进一步陷入新的治理危机当中。一方面,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往往受个体发展诉求与政绩彰显需求的双重驱动,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忽视村庄资源禀赋约束,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推进项目建设,易引发村级债务规模的非理性扩张^{[6][7]}。这不仅加大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流动性风险,更可能通过“借新还旧”机制形成债务循环陷阱,最终侵蚀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根基^[8]。另一方面,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可能通过权力资本化形成“寡头治理”,将农村集体资源倾斜至个人关联企业,造成“公地私营化”^[9],加剧农村集体资产流失。此外,村干部可能以“专业决策”的名义,剥夺普通农户对农村集体经济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基层民主流于形式,进而攫取村民的集体经济收益^[10]。

综上,已有大量研究对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针对这种差异根源的整体性认知及解释机制尚显不足。此外,在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尽管其内在逻辑链条完整,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存在局限,特别是对具有创业经历村干部治理成效的普适性验证仍显不足。因此,本文将探讨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借助2020年和2022年两期“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提供更为坚实的事实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实际组织者、管理者和运营决策者,村干部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实质性影响。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影响其经营理念、塑造其经营才能并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模式,从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一,村干部创业经历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绩效实质性提升。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多元化。根据“烙印”理论,个体经历(如上学、就业等)会深刻塑造其思想观念,并产生持续的“烙印效应”^[11]。在农民创业过程中,其工作内容和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思想观念会随之调整或被重塑。当带有创业“烙印”的村民担任村干部时,这类独特的经历和由此形成的市场化思维(烙印)会促使村干部更倾向于运用市场化经营理念运营集体经济组织,改变以往单纯依赖资

源出租、土地出让等“吃租经济”模式,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提供居间服务、入股分红等方式,为集体经济开辟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结构。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经营能力,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与农业龙头企业、供销合作社、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合作,通过“跨村联合发展”“村企抱团发展”等更加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简单的行政管理单元向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转变,提高集体经济收入。例如,广东南雄马站村村支书,在创业成功后,响应当地政府人才振兴的号召,返村任职,与市供销合作社达成“社村”合作,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特色丝苗米产业发展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增收。

第二,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管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创业实践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通过“干中学”实现增值的转化机制^[12]。相关研究表明,创业经历能够显著拓宽农民认知边界,在职业经验积累、知识体系重构及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等方面产生叠加效应^[13],进而催化其对现代管理范式与多元化经营理念的认知迭代,最终形成制度性企业家才能^[14]。当拥有创业经历这一特殊人力资本的村干部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后,一方面,其高素质、懂市场、善经营的智力支持能有效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管理人才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会将企业化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意识带入村庄的集体经济组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科学化、管理规范化和风险可控化,进而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管理转型。例如,广东翁源龙仙镇,在三位创业经验丰富的村支书带领下,由34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了强镇富村公司,将强镇富村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形成的资源资产纳入“三资”(资金、资产和资源)监管范围,按“三资”监管要求进行严格监管,接受纪检和审计监督,在投资新项目前,进行专业的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基于数据分析做出决策,而非凭经验或拍脑袋。

第三,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一方面,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推动集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创业经历使村干部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商业思维,有助于推动集体经济从低端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向高附加值、现代化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另一方面,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推动集体经济产品的品牌与市场建设,提高产品溢价。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更善于利用市场营销手段,为村里的产品和服务打造特色品牌,并利用其商业网络拓展线上和线下销售渠道,解决“产品如何卖出去、卖上好价钱”的核心问题。例如,江西金溪彭家村,在经商多年后返乡任职的村支书带领下,通过多平台直播带货特色农产品小笋干,让农产品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增加销售额超10万元。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村干部的创业经历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获取外部资源与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构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村干部的创业经历不仅是个人职业历程,更是他们重构社会资本与拓展关系网络的重要契机。乡村创业精英的个人能力只是其能够成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基础要素,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村庄资金、人才和土地等要素的统筹整合过程,会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第一,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社会资金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政府财政资金的公平性、普惠性目标导向,加之对资金的使用方向具有刚性约束和繁琐的申请程序,导致相当部分村庄难以突破资金困境,制约集体经济发展活力^[15]。在此背景下,社会资金获取渠道的拓宽与成本降低,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信用背书”作用,有利于村庄拓宽资金获取渠道。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形成的“隐性担保”效应,能显著消除民间资本对村集体的信任顾虑,为社会资金输入村庄创造关键前提。例如,江苏盐城运河村村支书利用自身在外创业经历,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担保,吸引社会资本入股500万元,发展茨菇种植业[®]。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利于融资网络构建,降低资金获取成本。创业经历赋予村干部更强的社会融资能力,其积累的客户、供应商及金融机构资源,能助力村集体构建多元化社会资本网络,更高效地对接正

规金融与民间资本市场,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获取成本^[16]。

资金作为流动性最高的要素,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资金获取渠道拓宽和获取成本降低,一方面,能有效克服集体经济启动初期面临的资源瓶颈,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缺钱”困境,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结构,推动集体经济从“财政依赖型”向“市场造血型”转型。另一方面,可撬动土地、人才、技术等多种要素的重组,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源整合,进而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能。综上,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将个人信用、经验与资源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取社会资金的能力,有助于破解传统资金困局。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二,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人才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社会联结作用,不仅能引导村域外的乡贤返乡参与集体建设,还能动员村域内的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一是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具有示范与带动效应,有助于动员在外的能人返乡。涉农专业人才的大量缺口,构成了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制度性困境^[17]。在此背景下,兼具企业家精神与乡土认同的复合型治理主体,即具备市场化运作能力的村干部成为突破人才瓶颈的关键要素。相较于行政主导的“外来式”引进人才,返乡人才因其固有的地缘文化资本,在产业适配性、治理合法性及文化认同度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致富带头人或经营性人才无法归土入乡是农村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18]。从社会资本转化视角,村干部创业经历带来的关系网络有助于突破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局限,以更低成本联络在外的各类人才,加之村干部以自身作为示范,提高了在外经商求学的能人返乡可能性^[19]。二是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尤其是成功的创业经历所积累的“能人威信”,有助于动员普通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创业经历村干部的社会资本优于多数普通村民,村民更愿意相信其带领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从而更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集体项目。这种能人威信能有效降低动员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建设活动的组织成本^[20]。

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凭借其示范效应与“能人威信”,有效吸引各类专业人才返乡,动员普通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建设,将村民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这一过程不仅降低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更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转效率,从而突破“缺人”引致的资源错配困局,最终形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合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村干部的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村庄人才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第三,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利于其整合村庄土地要素,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一是村干部创业经历赋予其的市场化思维有利于盘活土地经营权。创业经历使村干部对规模经济和土地资产流动性的价值理解更加深刻,更倾向于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激活存量土地的资产价值,唤醒“沉睡的资源”。二是村干部创业经历赋予其的市场化能力有利于推动村庄土地规模化、连片化。一方面,创业经历赋予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能人威信”和信任资本。在推动土地流转时,村民因其过往的商业成功经验而更愿意相信其判断和承诺,这极大地降低了土地整合中的协商成本和信任壁垒,润滑了整合过程^[21]。另一方面,相比普通村干部,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更善于设计灵活、可持续的市场化利益联结方式,提高预期收益,从而激励村民主动参与土地整合,实现土地的规模化、连片化。例如,江苏盐城新建村的村干部借鉴在外创业经验,采取“指导限价+积分评价”体系构建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有效保障了土地流转和生产经营平稳有序。三是村干部创业经历赋予其的市场敏锐度有利于提高土地资产溢价。村干部的创业经历使其能更加精准地识别土地的用途,凭借其较强的谈判能力,增加土地资产溢价。例如,浙江安吉鲁家村,经商出身的村党委书记朱仁斌在征得村民同意后,将村庄土地经营权统一量化作价入股旅游公司,村民每年获取相应分红,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变^④。

土地作为农村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高效配置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村庄土地经营权的盘活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将土地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标准化资产标的。一方面,集中连片的土地作为一种优质的经营性资产,其市场价值和抵押价值远高于分散地块,能增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连片规模化土地有利于机械规模作业与设施共享,推动农业生产集约化,从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4:村干部创业经历有助于其整合村庄土地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兼顾东、中、西及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均衡性,科学选取10个代表性省份;其次,采用县级人均GDP等距抽样法确保样本县在省域内空间分布均衡;再次,通过相同方法抽取乡镇和行政村样本;最后,基于村委会户籍资料对农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最终形成覆盖50个县、156个乡镇、300个行政村的全国性面板数据,包含村庄治理、农户家庭结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及收入构成等多维度的详细信息。在剔除部分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后,获得两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542个村庄样本。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村集体经济。本文参考芦千文、杨义武(2022)的方法^[22],通过“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万元)/村户籍总人口”来测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村干部创业经历。村党支部书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决策者与管理者,故本文以村党支部(党委)书记为研究对象。而且,从表1描述性统计来看,村党支部(党委)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均值达到0.764,说明大部分村庄是书记主任一肩挑。参考张志原等(2019)的研究^[23],依据村庄调查表中“任书记前的个人身份”这一问项判断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在任职前是否具有创业经历,如回答为“个体工商户”或“企业主”两项的,视为具有创业经历,取值为1;否则视为无创业经历,取值为0。

3.控制变量:村干部个人特征、村庄社会经济基础及自然地理条件。具体而言,在村干部个人特征层面,选取年龄、任职时长、受教育程度和兼任状况等变量;在村庄社会经济基础层面,选取村庄党员数量、劳动力外流程度与村庄贫困状况等变量;在自然地理条件层面,通过村庄地形和村庄封闭程度衡量地理区位特征。

4.机制变量:要素整合,具体包含社会资金要素整合、人才要素整合及土地要素整合。在社会资金要素整合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赋予基层组织“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职能,运转经费是其履行经济协调职能的物质保障。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村委会需“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运转经费通过降低制度成本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和数据的可得性,以村两委经费获取情况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的资金要素整合状况。其中,为区别财政资金要素、社会资金要素与村干部创业经历的价值匹配度差异,增加财政资金要素变量作为社会资金要素的对照组。具体地,财政资金要素整合通过村调查表中“村两委是否得到财政补助村级组织的运作经费”问项来测度,如获得,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社会资金要素则选择如下测度方式:2022年村调查表中的“村两委是否得到其他来源的专项资金支持”,如获得,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由于2020年村调查表中没有该问项,故通过计算村级党支部总经费与上级财政拨款的差额是否大于0判定社会资金获取,大于0时取值为1,否则为0。

人才要素整合以“本村外来农业规模经营户、外来个体工商户和返乡就业创业人才数量总和”进行刻画。土地要素整合则以“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占村庄总户数比重”来测度。本文选择以样本村庄中的农地转出户为分析对象,这主要出于如下考量:其一,鉴于土地固有的不可迁移属性,农地流转的组织工作通常由本村集体承担,农地转出行为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其二,转入农地的流入方多来自村外的各类主体,且调查数据中缺乏非本村居住的农地转出主体信息,加之转

入土地非本村所属,相关数据资料的获取面临重重困难,故剔除农地转入户样本。具体的,依据农户调查表中“土地转出原因”这一问项判断农户是否参与集中流转,如回答为“村集体统一流转”,视为该农户参与集中流转,进而通过“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村庄总户数”来测度村庄的土地要素整合程度。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核心解释变量	村干部创业经历	党支部书记在任职前是否有创业经历(1=是,0=否)	0.389	0.488	1	0	
被解释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万元)/村户籍总人口,取自然对数	0.374	0.583	5.693	0	
	年龄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岁)	49.042	8.426	70	25	
	年龄平方项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岁)平方项/100	24.760	8.115	49	6.25	
	任职时长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长(年)	6.675	6.752	31	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1;中专或高中=2;大专及以上=3	2.269	0.743	3	1	
控制变量	村“两委”一肩挑情况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1=是,0=否)	0.764	0.425	1	0	
	村庄党员数量	全村党员人数(人),取自然对数	4.034	0.598	5.464	1.946	
	劳动力外流程度	常年外出劳动力数/村常住人口	0.312	0.521	6.097	0	
	村庄贫困程度	曾经是否为脱贫攻坚贫困村(1=是,0=否)	0.310	0.463	1	0	
	村庄地形	村庄主要地形(1=平原;2=丘陵;3=半山区;4=山区)	2.240	1.292	4	1	
机制变量	要素整合	村庄封闭程度	村委会到县政府距离(km)	23.707	18.024	125	1
		财政资金要素整合:村两委是否得到财政补助村级组织的运作经费(1=是,0=否)	0.750	0.433	1	0	
		社会资金要素整合:村两委是否得到其他来源的专项资金支持(1=是,0=否)	0.204	0.403	1	0	
		人才要素整合:本村外来农业规模经营户、外来个体工商户和返乡就业创业人才数量总和(人),取自然对数	1.016	1.279	9.210	0	
		土地要素整合:参与集中流转农户数/村庄总户数	0.336	0.367	1	0	

(三)模型选择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CE_{it} = \varphi_0 + \varphi_1 VC_{it} + \gamma C_{it} + City_i + \delta_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CE_{it}为村庄i在t年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VC_{it}是村庄i村干部在t年的创业经历情况;C_{it}为一系列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City_i为省份固定效应,δ_t为时间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tata17.0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采取渐进纳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列(1)~(3)为逐步纳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由表2可知,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始终在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有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由此,研究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解释变量“村干部创业经历”反映历史行为,即时点早于被解释变量测度期,这种时间异步性可以削弱反向因果风险,使核心变量具备相对外生性。但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四

表 2

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1)	(2)	(3)
村干部创业经历	0.223 ** (0.090)	0.115 ** (0.053)	0.109 ** (0.048)
年龄		0.037 ** (0.018)	0.040 ** (0.020)
年龄平方项		-0.039 ** (0.019)	-0.0043 ** (0.021)
任职时长		0.002 (0.004)	0.002 (0.004)
受教育程度		0.042 (0.0044)	0.037 (0.042)
村“两委”一肩挑情况		-0.120 ** (0.058)	-0.112 ** (0.056)
村庄党员数量		-0.064 (0.040)	-0.065 (0.050)
劳动力外流程度		-0.116 *** (0.044)	-0.104 *** (0.040)
村庄贫困程度		-0.089 (0.059)	-0.083 (0.068)
村庄地形		-0.018 (0.189)	-0.015 (0.021)
村庄封闭程度		0.002 (0.003)	0.001 (0.002)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479 *** (0.046)	-0.213 (1.357)	-0.290 (0.584)
R ²	0.021	0.043	0.071
观测值	542	542	542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1. 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引入村户均集体经济总资产(“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万元)/村总户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替代测度指标。根据表3列(1)的回归结果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促进作用。

2. 滞后一期。考虑到村干部创业经历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滞后性,效应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且村干部创业经历可能存在与时间变化因素相关的自选择问题,故采用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经济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即采用前一期的村干部创业经历情况对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经济水平进行回归),阻断当前反馈效应以缓解自选择问题。表3列(2)的回归结果证实,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在考虑滞后效应后,结果依旧具有稳健性。

3. 缩尾处理。本文改变回归的观测值,将被解释变量上下5%缩尾后的观测值使用式(1)进行回归。表3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村干部创业经历仍在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这说明样本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上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剔除部分样本。一方面,中国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广东省新登记市场主体达278.3万户,居全国首位。另一方面,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制度性领先特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其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早于全国其他地区,导致广东省村均集体经济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省份。2023年广东省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698万元,分别为浙江省(344万元)的2.03倍与全国均值(134.8万元)的5.18倍^⑤。鉴于广东省在创业密度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上构成双重异常样本,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其剔除。表3列(4)的估计结果表明,当排除广东省样本后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依旧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剔除广东省样本后,本文的核心结论未受到影响。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缩尾处理	剔除部分样本
村干部创业经历	0.145 ** (0.067)	0.050 ** (0.022)	0.059 ** (0.028)	0.106 ** (0.05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6	0.088	0.045	0.083
观测值	542	267	542	487

(三) 机制检验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促进社会资金、人才和土地等要素整合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下面对这三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参照江艇等(2022)的方法^[24],通过估计村干部创业经历对资源整合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1. 社会资金要素整合。表 4 中列(1)(2)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分别对财政资金要素整合和社会资金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财政资金要素整合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村庄的财政资金支持更多的是依赖上级政府的规划和统筹,财政资金的核心功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其分配优先遵循“需求导向”而非“能力导向”。也就是说,只要村庄符合政策条件,按需分配的财政资金支持均可到位^[25]。村干部创业经历对社会资金要素整合的影响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显著提升财政资金以外的社会资金要素的整合效率,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2. 人才要素整合。表 4 中列(3)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人才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村干部创业经历对人才要素整合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有效吸引各类人才,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3. 土地要素整合。表 4 中列(4)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土地要素整合的估计结果。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土地要素整合的影响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能促进农地集中流转,提高村庄土地整合效率,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研究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4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财政资金要素整合	社会资金要素整合	人才要素整合	土地要素整合
	(1)	(2)	(3)	(4)
村干部创业经历	0.028 (0.039)	0.076 ** (0.035)	0.282 *** (0.093)	0.049 ** (0.02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8	0.079	0.210	0.603
观测值	542	542	542	542

(四) 异质性分析

1. 正式制度差异。既往案例研究发现,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导致精英治村的效果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26]。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在不同正式制度环境下,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参考李小荣和毕云霄(2024)的研究^[27],将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的参考依据^⑥,将样本村按照市场化指数中位数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如表 5 所示,在市场环境越好的地区,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这说明村庄

所在地区的正式制度越完善,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差异。奥斯特罗姆指出,界定公共池塘资源的边界和明确规定被授权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是组织集体行动的第一步,即明晰的产权边界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8]。据此,本文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的集体产权特性,选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完成资格认定”衡量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排他性和稳定性程度,采用“成员股权是否以户为单位”衡量集体产权结构的治理效率,采用“本村集体资产股权是否量化到人”衡量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彻底性,以此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异质性条件下,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如表6所示,在已完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成员股权以户为单位和本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到人的村庄,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并且都通过了组间差异检验。

表6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1)	(2)	(3)	(4)	(5)	(6)
	已认定	未认定	以户为单位	未以户为单位	量化到人	未量化到人
村干部创业经历	0.057 [*] (0.032)	0.007 (0.120)	0.168 [*] (0.893)	0.146 (0.216)	0.071 ^{**} (0.035)	-0.237 (0.1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4	0.003	0.081	0.140	0.056	0.950
组间差异(P值)		0.042		0.023		0.021
观测值	133	134	172	95	153	114

注:由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缺乏这部分数据,仅使用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共计267个样本村庄。

(五)拓展分析

1.激励调节效应。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准公共物品,在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搭便车”问题。奥尔森(2014)认为,通过提供排他性激励,使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获得额外收益(正向激励),能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29]。这种选择性激励包括以经济性激励为代表的显性激励和以社会性激励为代表的隐性激励^[30]。据此,本文分别从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两个角度来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激励效应。其中,经济性激励通过“村干部收入中是否包含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的收入”度量,社会性激励用“村干部是否受到乡(镇)及以上的表彰”刻画。由表7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经济性激励还是社会性激励,都会进一步放大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此,要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别是担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责任的村干部以一定的内在激励,以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2.农户收入提升和分配效应。上文已证实村干部创业经历能有效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

表5 正式制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1)	(2)
	市场化程度较高	市场化程度较低
村干部创业经历	0.223 ^{**} (0.094)	-0.028 (0.03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103	0.117
组间差异(P值)		0.022
观测值	309	233

表7 激励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	
	(1)	(2)
村干部创业经历	0.063 ^{**} (0.032)	0.061 ^{**} (0.030)
村干部创业经历×经济性激励	0.147 ^{***} (0.040)	
经济性激励	0.114 (0.050)	
村干部创业经历×社会性激励		0.147 ^{***} (0.403)
社会性激励		0.238 (0.2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1	0.053
观测值	267	267

注:由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缺乏这部分数据,仅使用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共计267个样本村庄。

平,但在当前农村治理中普遍存在基于“精英—普通村民”二元分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具有创业背景的村庄精英主导村务决策时,可能引发以下治理困境:其一,精英群体通过制度性优势形成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其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异化为精英群体进行权力寻租的场域,即“精英治社”视域下可能存在“精英俘获”和“大农吃小农”的现象^[31]。为检验这一猜想,以下基于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一,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根据表8中列(1)的回归结果,村干部的创业经历及其与农村集体经济的交互项都能显著提升农户的收入,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第二,验证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体的,参考马太超等(2025)的研究^[32],通过相对剥夺指数来测度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观察表8列(2)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具有创业经历的村干部选择担任村“两委”职务,大多怀着一种对家乡的责任与情怀,其通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遵循“共同富裕”的信念进行分配,在推动农户收入整体提升的同时,还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性职能,将部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如为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设立公益性岗位,为他们提供收入保障,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3. 基层治理效应。上文提及创业精英治村可能会通过资本优势形成政治精英寡头化格局,基于私人网络异化干群关系,以及采用市场化手段简化基层治理流程,导致村庄政治精英寡头化、干群关系私人化和治理过程省事化^[33]。为检验这一观点,本文从村级债务水平和村民集体经济参与度两个维度考察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其中,村庄债务通过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总额(万元)/村户籍人口数”取自然对数测度,村民集体经济参与程度则以“参与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农户数占村庄农户总数的比重”测度。由表9可知,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务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村干部创业经历并不必然导致村庄债务增加,关键是要通过制度设计约束村干部权力,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村干部创业经历在5%的水平上负向影响村民的集体经济事务参与程度,说明的确存在创业精英对普通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排斥效应^[34]。这一结果印证了上文猜测,即在能人治村模式下,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监事会)易出现形式化、空心化倾向,存在被精英群体单向主导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权力结构异化可能诱发决策封闭化与监督失效等治理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完善村民议事会、第三方审计等制度约束个人决策权,防止资源整合异化为“精英俘获”。

表8 农户收入提升和分配效应检验

变量	(1)	(2)
	农户收入	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村干部创业经历	0.185*** (0.071)	-0.046* (0.027)
村干部创业经历×农村集体经济	0.207** (0.090)	-0.128* (0.067)
农村集体经济	0.144 (0.141)	0.001 (0.0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230	0.945
观测值	6381	6381

注:基于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该检验。

表9 基层治理效应检验

变量	(1)	(2)
	村庄债务	集体经济参与程度
村干部创业经历	-0.005 (0.041)	-0.492** (0.21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2	0.106
观测值	542	542

五、结论与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建设一支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复合型村干部队伍。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村干部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资源整合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决策和推动作用。其综合能力不仅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成效,更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质量。面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新要求,系统提升

村干部的政治领导力、产业运营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重中之重。

本文利用2020年和2022年两期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基于要素整合视角,考察了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干部创业经历能够显著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主要通过整合社会资金要素、人才要素和土地要素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创业经历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集体产权边界更明晰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在村干部创业经历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村干部创业经历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村干部创业经历对村庄债务的影响不显著,但会降低村民的组织事务参与程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持续引导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民返村任职,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积蓄人才。一是要转变传统的村干部选任思路,将创业经历、企业家精神作为选拔、推荐村干部,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和集体经济负责人的重要考量指标。二是要多措并举,激励兼具创业经验与乡土情怀的复合型人才返村任职,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应逐步建立本乡籍在外企业家数据库,逐步完善村庄常规的人才联络机制,通过情感关怀激发他们返村任职、造福家乡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主动发掘和吸引本土的成功企业家、合作社带头人、外出经商返乡人员进入村“两委”班子和集体经济组织。三是要建立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明确在集体经济发展探索中,因不可预见的市场风险导致的非主观失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探索“经济奖励+荣誉表彰”等激励机制,将经营绩效与政治荣誉、社会地位挂钩,激发其持续创业的动力,避免“干好干坏一个样”。

第二,加强农村集体的资金、人才和土地整合力度,探索农村集体经济长效发展机制。一是在社会资金整合上,支持由村集体牵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投资平台公司,并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其高效、规范地吸纳和运作社会资本、财政资金和村民闲散资金。二是在人才要素整合上,鼓励村干部以其个人商业网络为桥梁,将对接到的专家、企业家、技术人才以恰当的方式纳入集体经济发展智囊库,实现人才的持续输入。三是在土地要素整合上,支持村干部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主导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小田变大田”等项目,将分散、闲置的土地资源集中规划、集约利用,为集体经济发展腾出空间。

第三,根据村庄特点实施精准指导,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根据村庄市场化程度实施分类指导策略。对东部沿海、城市近郊区等本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村庄,政策重点应放在“放权赋能”上,减少行政干预,鼓励村干部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对中西部、传统农区等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村庄,政策重点则应放在“筑基培育”上,优先帮助其改善集体经济经营环境。二是要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资产折股量化、登记颁证等工作,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村民变股东”,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村干部的内在潜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年版,第24和36页。

②案例信息来自本课题组实地调研,以下未标注的案例,均来自本课题组实地调研。

③资料来自搜狐新闻网:《阜宁:“创业型”村支书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http://news.sohu.com/a/539336301_121106832。

④资料来自央视网:《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村支书朱仁斌:“有多大能耐,我都使出来”》,http://news.cctv.com/2018/03/23/ARTIttFgtA4ptQrLajnTlxFr180323.shtml。

⑤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年版,第25页。

⑥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0—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5和47页。

参考文献:

[1] 阮若卉,罗明忠.基于价值共创意识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6-29.

- [2] 韩旭东,杨慧莲,郑风田.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23(8):113-126.
- [3] 孙琼欢.派性政治:村庄治理的隐形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6-60.
- [4] 肖唐镖.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6(9):64-70.
- [5] 李敏,姚顺波.治理制度、村干部素质与村级治理能力[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05-117.
- [6] 崔盼盼.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31-140.
- [7] 黄岩,李欣茹.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基于鄂东D村的个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10):10-19.
- [8] 陈锋,孙锦帆.返乡能人“经营村庄”的路径、机制与风险探析——基于两个村庄的案例研究[J].社会建设,2022(3):7-17.
- [9] 王黎.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21-129.
- [10] 桂华.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J].人民论坛,2020(23):55-57.
- [11] 周怀康,姜军辉,葛淳棉,等.创业归来再出发:创业烙印如何影响工作绩效?[J].管理世界,2021(7):145-161.
- [12] Galor, O.,Stark, O. Migrants' Savings,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Migrants'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0,31(2):463-467.
- [13]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26.
- [14] 孙武军,徐乐,王轶.外出创业经历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J].统计研究,2021(6):57-69.
- [15] 徐冠清,崔占峰,朱玉春.财政扶持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分异”与治理绩效评价——“经营型”和“债权型”集体经济的比较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5(1):85-106.
- [16] 王进,冯仁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实践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25(4):101-123.
- [17] 方中华.乡村振兴如何破解人才瓶颈[J].人民论坛,2019(9):57.
- [18] 罗明忠,杨怡.制度嵌入、企业家精神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梅州市“产业村长”制度的剖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68-180.
- [19] 罗大蒙,吴理财.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45-154.
- [20] 祁玉梅.农村创业,难在哪里[J].人民论坛,2018(27):80-81.
- [21] 谢治菊,黄美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有效运行?——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探索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5(2):3-25.
- [22] 芦千文,杨义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22(3):84-103.
- [23] 张志原,刘贤春,王亚华.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9(1):66-80.
- [24]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25] 杜永康,张新文.党委统领合作社:共同富裕目标下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基于贵州鸭池镇“两包一干”的经验诠释[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47-58.
- [26] 魏程琳,王木林.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10-119.
- [27] 李小荣,毕云霄.信任的“双刃剑”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30-141.
- [2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8-110.
- [29]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6-63.
- [30] 罗必良.要素交易、契约匹配及其组织化——“绿能模式”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启示[J].开放时代,2020(3):133-156.
- [31] 徐乙尹,钟鑫,申云.“精英治社”会导致农贷“精英俘获”吗?[J].财经科学,2022(11):73-87.
- [32] 马太超,张春华,王乾坤.驻村第一书记与农村地区共同富裕——基于CRRS(2022)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

[33] 陈文琼.悬浮型农村与基层治理断裂带——对农民主体缺位和基层治理内卷的再解读[J].贵州社会科学, 2024(9): 145—153.

[34]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 2011(2): 111—119.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Element Integration and Collective Economy

RUAN Ruohui¹ LUO Mingzhong^{1,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Rural Revitalization Laboratory,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data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CRRS) in 2020 and 202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village cadres'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 integr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mai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y integrating social funds, talents and land elements.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has a great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villag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clearer boundarie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ocial incentives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s of village cadres 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ut also further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within rural areas.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village cadres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village debt, but it will reduce the degree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al affairs. Therefore, multipl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elite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uarantee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Village Cadr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Element Integr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责任编辑:易会文)